



从「打不死」到「打不散」

——《归队》对东北抗联精神的诠释

□徐海龙

反映东北抗联历史的影视作品不在少数,从20世纪的《归心似箭》《最后八个人》《步人辉煌》到新世纪以来的《杨靖宇将军》《悬崖之上》,这些作品从各个角度展现了这段林海雪原上的红色史诗。近日热播的电视剧《归队》塑造了普通战士的群像,但叙事重点并不是他们在战场上的奋勇杀敌,而是部队被打散、战士回乡之后的生活。

《归队》中,鲁长山、汤德远等抗联战士从极端恶劣残酷的战场环境中幸存回乡、暂时“复员”,其生存条件无疑出现了巨大好转。从人之常情来讲,这些人物可以就此告别战场和部队,选择安稳生活,但他们为何能从“打不死”(回乡)发展到“打不散”(归队)?这成为该片的叙事主线。可以说,创作者在叙事进程中有意识地从地缘、亲缘、政缘三种社会关系上,回答了这一问题,从而彰显了东北抗联精神的独特光辉。

所谓地缘,是指人们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共同生活、活动而交往产生的人际关系。《归队》通过人物言行、场景和影像,真实展现了抗联小分队在东北大地的作战与生活,尤其是在部队被打散后,鲁长山、汤德远等抗联战士或返乡回家,或在松林镇暂时落脚,此时作品展现出东北特有的地缘文化。《归队》里的抗联士兵与当地百姓的关系立体、多维。例如鲁长山混在挖参队里,汤德远回乡经商、娶妻生子,高云虎与松林镇的酒馆老板娘大闹枝暗生情愫,兰花儿成为山寨头子小白马的“压寨夫人”。由此,剧中为观众展开一幅丰富的风土人情和社会画卷。更重要的是,这些场景不仅展示地缘文化,也寄托着隐于民间的抗联战士的自我身份意识和斗争信念。例如高云虎和福庆正是在二人转演出中引出了日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指导、北京市广电局重点扶持并列入“北京大视听”重点文艺项目的电视剧《归队》,以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联军的活动为历史背景,讲述了抗联小队在一场惨烈的战斗中被打散,但他们秉持着“只要打不死,那就打不散”的坚定信念,历经千难万险、生死考验后再次集结归队的故事。该剧播出后,引发业内关注和观众热议。本期两篇文章,从东北抗联精神的影像转译与影视创作手法的创新表达两个方面展开深入解析,探讨如何更好地以文艺作品感悟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编者



冷峻与温暖的交融 史诗与日常的平衡

——《归队》创作手法探析

□李 蕾

冰天雪地,凛冽刺骨,鲁长山俯身拾路路上的马粪,挑拣其中未被消化的玉米粒吃——电视剧《归队》开篇就以这样一个令人震撼的场景,将观众拉回到八十多年前东北抗联最艰苦的岁月。这段情节以1938年冬天为背景,那正是东北抗联斗争最艰难的时期。日军实施残酷的“归屯并户”政策,将百姓强行迁入集团部落,把原野村落变为无人区,彻底切断抗联的粮食供应。在饥寒交迫的极端条件下,抗联战士依然坚持斗争,用生命和热血书写中国抗战史上的悲壮篇章。

《归队》在叙事结构上大胆创新,采用多线并行、交叉推进的方式拓展表达维度。与以往抗战题材创作多聚焦宏大战场和激烈战役不同,今年涌现的许多相关题材作品倾向于从更细微、更日常的视角切入历史讲述。而《归队》正是这一创作趋势中尤为突出的代表。剧中,抗联小分队在拐子河的战斗中遭遇重创后被迫分开,六位队员各自踏上艰险曲折的归队之路。排长鲁长山与田小贵意外闯入人参帮,获得一株百年老参。为了实现参把头卖参为部队筹集物资的遗愿,二人周旋于阴险的特务与精明的商贾之间,在利益算计与江湖道义的博弈中展现非凡的生存智慧。福庆先是与高云虎落入黑矿山,经历惊心动魄的矿难,后又与汤德远一同陷入暗无天日的日本劳工营,在非人折磨中坚守抗争火种。兰花儿负伤后,被落草为寇的葱山小白马所救,两人渐生情愫。然而兰花儿始终不忘归队的使命,试图以抗日大义说服小白马,带领山寨队伍下山抗战。与此同时,高云虎在矿难中侥幸生还,被豪爽泼辣的酒馆老板娘大闹枝收留。他暗中查出黑矿山故意制造塌方事故、以残害矿工性命骗取抚恤金的真相,决定杀死幕后黑手游世龙,为死难工友讨回公道。这些线索既独立成篇,又彼此交织,共同绘就一幅个体命运与家国情怀紧密相连的抗战画卷。

多线叙事不仅能拓展剧集的空间维度,更通过每个人物的独特经历,赋予了“归队”主题更加丰富的思想内涵。对鲁长山来说,归队是组织与责任的召唤;对汤德远来说,归队是忠孝两难间的权衡与抉择;对田小贵来说,归队是褪去富家少爷身份、在

战火中塑造自我的精神淬炼;对兰花儿来说,归队是革命理想与个人情感交融的毅然奔赴;对高云虎来说,归队是从温柔乡到战场的成长转变;对福庆来说,归队则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坚持。但无论经历何种境遇,他们一直铭记离散之际立下的约定:“奔牡丹江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在那找到最粗最高的那棵松树,把自己的号刻上去。”最终,所有奔赴都在松树下交汇,抗联战士们不仅完成了身体意义上的集结,更实现了精神层面的回归。这样的设置,使《归队》突破了传统抗战题材的叙事框架,升华为一部关于信念、成长与生命选择的时代寓言。

将叙事根植于真实的历史肌理与人性逻辑,展现普通人在忠孝、情义之间的艰难抉择。《归队》是高度戏剧化的故事,但观众却觉得特别真实。这是因为创作者始终将叙事根植于真实的历史肌理与人性逻辑。编剧高满堂早在创作“《闯关东》三部曲”期间,就采访了三十多位抗联战士,积累了珍贵的一手史料。这次为创作《归队》,他再度深入东北,寻访第八十八国际旅的后人。这些素材被真实而克制地写进了剧情当中,例如抗联小分队分食一块饼子,转了一圈仍未吃完,这些细节真实揭示了抗联战士所面临的极端困境,以及绝境中不曾熄灭的人性光辉。

更难得的是,剧集并未将英雄的坚定表现为从不动摇,而是真实地刻画他们于小家与大家、个人情感与民族大义之间所经历的痛苦挣扎与艰难抉择。汤德远逃出日本劳工营后回乡,面对年迈体弱、亟待照顾的父母,一度陷入是尽孝还是归队的剧烈挣扎;高云虎在大闹枝的酒馆中体会到温暖情谊,也削弱了他重返战场的决心;而鲁长山归家后,看见妻子憔悴的面容和孩子陌生的目光,亦为多年疏于照顾家庭而深深愧疚自责。这些细腻真切的情感刻画,不仅没有削弱英雄的形象,反而让他们更加血肉丰满。因为他们不仅是战士,也是儿子、父亲、爱人,有着普通人的牵挂与软肋。在犹疑、痛苦与自我拷问之中,他们的选择显得愈发真实而珍贵。

在刻画抗联战士的归队历程同时,作品还将叙

事视野拓展至东北的广阔社会图景。从苍茫的深山老林到喧闹的市井酒馆,从神秘的采参林场到残酷的金矿矿山,该剧塑造了众多形形色色的立体人物。这些人物性格鲜明、动机各异,共同构筑起东北社会复杂多样的面貌。在辽阔而细腻的叙事中,那些于苦难中挣扎前行、却依然选择坚守信仰的灵魂,显得更加真实而鲜活。这些生命个体汇聚成抗日战争的有生力量,共同书写出中国必将胜利的历史答案。

冷峻风格与烟火气息在镜头下交相辉映,《归队》成功营造出一种独属于东北的美学风格。在艺术表现上,剧组深入辽宁、吉林等地的林海雪原,在零下30℃的环境中实景拍摄几十个主要人物、将近1400场戏。该剧镜头下的东北既有白山黑水的广袤厚重,又有荒原雪林的肃杀粗犷。尤其是八棵松的场景极具象征意义,在一片白茫茫的冰雪世界中,一棵松树屹然挺立。这里作为归队的终极目的地,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精神信仰的视觉化身。剧集还在冷峻的基调中注入了浓郁的生活气息。硬到咬不动的野菜饼子、露出飞絮的棉袄等物品,成为那段艰苦岁月的真实注脚。

不过,剧集并未沉溺于对残酷与冷峻的单向描摹,而是为温暖日常留下充分言说的空间。福庆与高云虎轻松搞笑的互怼日常、小白马对兰花儿深情而笨拙的守护、鲁长山老婆对鲁长山的理解与照顾等,这些生动片段与质朴粗粝的东北方言交织在一起,不仅展现了黑土地人民苦中作乐的豁达天性,更在残酷的战争背景下勾画出人情的热度。这种冷峻与温暖的交融、史诗与日常的平衡,正是《归队》的艺术魅力所在。

抗战胜利从来不是一个人的英雄传奇,而是一群普通人在极端环境下依然选择坚守、选择归队的集体史诗。在抗战胜利80周年的今天,这种“归队”精神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它关乎信念,关乎选择,关乎每个人在时代中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和价值。

(作者系光明日报影视与舞台艺术编辑室副主任、高级记者)

《我们的河山》:抗战历史的正确打开方式

□张德祥

电视剧《我们的河山》是一部具有强烈真实感、惨烈生死感和悲壮历史感的抗战题材作品。你经历过生死存亡吗?你经历过向死而生吗?今天的中国人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度里,再也没有列强能够在“我们的河山”上横行霸道。但是,80多年前,我们的河山、我们的家园被日本侵略者肆意践踏,国破家亡,生灵涂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七七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实施“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华北沦陷,大半个中国相继沦陷。该剧以鲁南闾城县为切入点,聚焦日本侵略者来到闾城后的情形。国民党地方政要多数人物都是“识时务”者,认为日军强大,不可抗拒,或望风而逃,或主动与日本人合作,助纣为虐,比如警察局长李明经,就被日寇任命为伪政府的知事。日寇到来,破城摧寨、搜刮财物、抢掠粮食、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加之皇协军、土匪的“改头换面”,他们无不向老百姓勒索财物,百姓不堪重负。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危时乱局。该剧的真实性,首先是写出了老百姓不得安生、不能活命的困苦处境。人人都在刺刀下讨生活。村村寨寨、家家户户随时都可能有无顶之灾。在闾城县,鬼子进村扫荡,老百姓被无辜杀害,这是中国人曾经遭遇的生死劫。任何抗战题材作品,如果回避中国人曾经遭受的被欺辱、被奴役、被杀戮的惨痛处境,就不可能真正触碰到中华民族的痛和耻,也就不可能真正写出中国人奋起反抗的愤和勇。《我们的河山》的厚重,就在于有这样真实的历史再现,带领今天的观众重回历史现场,感受那种向死而生的经历。

《我们的河山》从七七事变写到抗战胜利,这八年的抗战岁月,漫长、艰苦、惨烈、悲壮。这期间,闾城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日寇和土匪被消灭,人民当家作主。这一切的发生都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建立了抗日根据地,以庄靖风、周密、彭勇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在鲁南地区发动群众,把一盘散沙的民众组织起来,团结一切拥护抗日的力量,组成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



农救会,建立地方抗日民主政权,实行减租减息;还在八路军的支持下,建立自卫队、武工队等地方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运动战,与日寇展开斗争,逐步拔除敌人的据点,使日寇的统治失去社会基础。侵华日军大势已去,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以山下聪为代表的侵略者最后被包围,死在他们修筑多年的地下工事里,中国人民最终迎来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充分彰显了中

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该剧用丰富生动的情节,众多鲜活的人物形象,再现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真谛。

《我们的河山》给人一种厚重密实之感,这种厚重密实之感正在于剧中村庄多、人物众、矛盾杂。该剧详细叙述的村庄就有大王庄、吕家寨、贺家村、崔村、刘村、松山峪等,村村都有自己的人物和故事。比如,刘村在日寇的扫荡之下,一开始老百姓还存在着以妥协和求安宁的愿望,这种愿望很快被残酷的现实击碎,越是妥协,越是成为鱼肉。最终老百姓觉悟了,只有拿起武器,才能保卫家园。人物多,体现在剧中主要人物有十多个,庄靖风、周密、刘祖光、刘竹梅、邱家盛、王成、彭勇、张治平、吕英等,这些人物个个性格鲜明,尤其是女侠吕英,武艺高强,性格泼辣,一腔正气,敢作敢当,是个响当当的鲁妹子。矛盾杂,则表现在村与村的矛盾,穷与富之间的矛盾,老百姓与土匪、与日寇、与汉奸的矛盾等,危局乱世,各种势力相互倾轧,来回反复。但是,这一切头绪都被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之间的主要矛盾所牵动,形成了叙事的辐辏效应,密而不乱、线索清晰,不失叙事的流畅性。

总之,《我们的河山》是一部有真实历史存在感、有众多人物形象支撑、有复杂矛盾纠葛且情节丰富的剧作。更重要的是,该剧体现了正确的历史观,揭示了抗日战争必胜的历史逻辑和正义性,显示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全民族抗战的伟力。我以为,这是打开抗战历史的正确方式,是真正走进历史、走进人民的剧作。

(作者系文艺评论家)

本报讯 8月22日,由中国电视艺委会主办的大型纪录片《卢沟桥:我们的纪念》研讨会在京举行。该片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推出的大型纪录片,通过“一件文物、一段故事、一段历史”的结构,将历史场景与当代展陈紧密相连,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深刻昭示了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的伟大真理。

该片创作总监闫东表示,《卢沟桥:我们的纪念》结合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改扩建过程,将展陈设计和文物背后的人物故事相结合,聚焦小人物里的大情怀,在个体故事中折射家国命运。与会专家认为,该片依托权威资源与学术支撑,以“文物叙事”激活历史记忆,实现了个体与时代的深情对话;以“老兵故事”穿透历史时空,实现了情感共鸣与精神传承;以创新全媒体传播矩阵,推动了主流叙事“破圈”。该片以光影为榫卯,以记忆为梁柱,在历史烽烟与当代思考之间,架起了一座能触摸、有温度的“精神卢沟桥”。(许莹)

专家研讨纪录片《卢沟桥:我们的纪念》